

ПОВЕСТЬ О ЖИЗНИ
К. 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



一生的故事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6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生的故事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 生 的 故 事

第 六 部

■ 第一部 遥远的岁月

■ 第二部 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

■ 第三部 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

■ 第四部 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

■ 第五部 投向南方

■ 第六部 漫游的书

■ 责任编辑\孟保青 高树海
■ 装帧设计\慈立群

目 录

第六部 漫游的书

最后一次相见.....	1
田野上的寂静.....	8
“第四版”	20
夜车	33
严寒	46
雪帽	55
欢送教练舰	61
免费的烟草	69
捕鸟人	72
相当难的职业	90
森林里的居民	95
铜脚掌	97
泥盆纪石灰石.....	107
“小科诺托普”.....	121
“不会成功的!”	135



第六部 漫游的书

一张旧地图	141
荷兰干酪的一张包装纸	159
沙漠的考验	161
故事和地理	176
炮厂	187
火热的科尔希达	203
小河韦尔图申卡	222
就像开始时那样生活吧	234
译后记	238

第六部 漫游的书

回忆过于沉重地压着我的双肩，
即使在天堂里我也会为尘世哭泣……^①
——玛丽娜·茨韦塔耶娃

最后一次相见

我花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从梯弗里斯来到基辅。

列车到达基辅时已经快到晚上了。春意正浓，春色满园，栗树繁花盛开，落日炎热的余辉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的圆顶上闪着红光，克列夏季克广场打扮得十分漂亮，人声嘈杂。在我的眼里，妈妈和加莉娅姐姐住的那间小屋好像显得更加可怜和空荡荡的了。

从我离开基辅去敖德萨，后来又去梯弗里斯，已经过了两年

^① 参见俄国女诗人玛·伊·茨韦塔耶娃(1892—1941)的诗：《在天堂里》。

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妈妈和加莉娅都见老了，不过心情却平静一些了。

一有可能，我就给妈妈寄钱来，并一直为钱太少，而且总是要隔一段时间才能寄一次钱来而感到苦恼，但妈妈并不抱怨。我确信，她的性格的确是坚韧不拔的。

“科斯季克，”在最初的流泪和最初的一些杂乱无章的询问以后，她说。“我和加莉娅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不用花多少钱，日子过得还不错。”

“这是个什么办法呢？”

“你看看这间房子——你就会明白了。”

我仔细看了看这间房子。屋里的墙是黄色的，像医院里一样，家具少得可怜——两张不结实的铁床，一个旧橱，一张厨房里用的桌子，三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和一面挂着的镜子。这一切上面都蒙着一层灰色的东西，好像是灰尘。但是什么灰尘都没有。是陈旧和不断用抹布擦洗，使这些东西都具有灰暗的色调。

“你听我说，”加莉娅说，并且病态地对着阳光照射进来的窗户那边微微一笑。“你听我说，我和妈妈甚至还进行修理呢。”

我还没来得及和妈妈单独在一起，问问她加莉娅的视力怎么样了，不过我留心看着加莉娅，明白了她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盲人，完全失明了。妈妈用目光向我示意，望了望加莉娅，匆匆从一件旧毛线上衣的袖子里掏出一块小手帕，紧紧捂到眼睛上。

“妈妈，”加莉娅惊恐地问。“你怎么啦？哭了？”

“高兴得哭了，”妈妈用控制不住的声音回答。“科斯季克来了，我们大家又在一起了，我和你又不只是两个人了。”

“科斯季克来了，”加莉娅慢慢地又说了一遍。“来了！我的弟弟。”她迟疑地补了一句，仿佛是把介绍给什么人。“是的，

我的弟弟!”

她沉默了一会儿。

“科斯季克,你听我说,我和妈妈争论了好久,应该把墙刷成什么颜色,结果刷成了橙黄色。很漂亮,是吧?”

“非常漂亮,”我望着刷着一层廉价的黄颜色的墙回答。“非常好看。”

“妈妈说就是在阴天,我们屋里也好像有太阳照耀着。对吗?”

“对,”我回答。“这墙的颜色很鲜明,令人很愉快。你们是在哪里找到这么好的颜色的?”

“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加莉娅说,又微微一笑,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旁边什么地方。“不过我感觉到,从墙上简直是冒出一股暖气来。”

她扶着那张粗糙的、厨房里用的桌子,慢慢向我走来。我站起来迎着她走过去。她摸到我的手指,手顺着我的手臂摸到肩膀,碰到了我的面颊。

“哎哟,你怎么没刮脸啊!”她说,说着笑了起来。“我扎着了手指头。我已经不做假花了,看不见。现在我们的邻居,一个编结女工,让我给她把粗毛线捋开,绕成大线团。每绕一团,她给我两卢布。”

“加莉娅绕粗毛线的时候,我就给她念点儿什么。科斯季克,现在你明白我们是怎样生活的了吧?”

“是的,我明白了,”我回答,竭力不显露我不安的心情。“我全明白了。”

“我们,”妈妈说。“把一切多余的、所有不需要的东西全都卖了。”

“在日特市场上卖掉的，”加莉娅补了一句。“譬如说，我们干吗需要茶炊呢？还有那些贴着全家人照片的旧丝绒相册。这样的相册，我们有四本，许多年来它们一直保存在科兹洛夫斯卡娅太太那儿。”

科兹洛夫斯卡娅是个年老体衰、性情温和的老太婆，是妈妈很久以前的女友。

“所有照片我都留下来了。”妈妈好像辩解似地说。

“妈妈运气真好。她根本没料到，现在有谁会来买这些相册。”

“你知道是谁买的吗？”妈妈插进来问。她活跃起来了，甚至笑了起来。“兄弟修道院里的一个僧侣。他把四本相册全买去了，他需要这些相册。你猜猜看，科斯季克，做什么用？”

我当然猜不出。

“丝绒封面很厚很重，”妈妈解释。“用它们可以做成很漂亮的、简直是非常考究的《圣经》上的封面。僧侣把这些《圣经》卖给各个乡村教堂，我们却用不着保存这些废物了。这样过得更安心。我一生都说，东西在消耗我们的全部精力，在折磨我们。它们就像指使短工那样，强迫我们为它们工作。总之，”妈妈说，好像是制止一场拖延了很长时间的争论。“这样生活要轻松些。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压缩到最低限度。”

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稍带点儿骄傲的语气。

“那个老太婆怎么样了？”我问加莉娅。“那个向你买花，拿到巴伊科夫墓地上去卖的老太婆？”

“这个老太婆死了。我单用母菊给她的坟上做了一个花圈。”

“一个很好的花圈，”妈妈叹了口气。“最后一个。我这就去

把午饭热一热，然后你把自己的事都讲给我们大家听听。好吗？暂时你们先在阿玛莉娅屋里坐一会儿，要么到阳台上去，在户外坐坐。”

我搀着加莉娅的手，领着她穿过阿玛莉娅的房间来到阳台上。阿玛莉娅不在家。加莉娅在地板上走的时候，好像是蹚水过一条浅水河，一边用脚试探河底。

我和她坐到阳台上。阳台朝着植物园，偶尔有电车尖叫着在比比科夫林阴大道上慢慢爬过去。弗拉基米尔大教堂广场上，大块鹅卵石之间已经长出了高高的杂草。

快到晚上了，许多窗户反射过来的落日的余晖洒满了街道。

“科斯季克，”加莉娅问。“你真的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吗？”

“你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吉莉达顺路到我们这里来，她是埃马·什穆克列尔的姐姐。你记得她吗？”

“当然记得！那么高，看上去全身各部分很不相称。”

“真的吗，可是据说现在她是个美人儿。你认不出她来了。这就是她说的。你怎么不把小说寄给我们呢？”

“我带来了。”

“那么我说，”加莉娅神秘地说。“你把它们放到妈妈的床上，放在枕头上，自己什么也别跟她说。你知道吗，现在这是她惟一的梦想了，梦想你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久前妈妈谈起你，说如果你哪怕能多少做一点儿对人们有益的好事，那么你就可以用这来赎——她就是这么说的：‘赎’——父亲的一切错了。请你告诉我，你写的那些能帮助人们，使他们少受点苦难吗？你是怎么想的？”

正门呼的一声响。

“快藏起来，”加莉娅很快地说。“这是阿玛莉娅。瞧，她准会大吃一惊！”

我躲到一个栽着一大棵夹竹桃的木桶后面。阿玛莉娅进来了，站到窗间壁镜前，抬起手来，疲倦地整理了一下她那仍然美丽的头发。

“我坐在您的屋里，”加莉娅说。“因为妈妈在煎肉饼，我们屋里有油烟。”

阿玛莉娅冷笑一声，问：

“他在哪里？”

“谁？”加莉娅惊慌地问。

“他在哪里？”阿玛莉娅又问了一遍。“科斯季克。前室里挂着他的外套。”

这时她看到了我，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房屋中间，搂住我的脖子，像个农妇一样，用力出声地吻了好几次。

我照加莉娅给我出的主意，晚上把从刊载我三篇小说的报纸上剪下的剪报放到妈妈的枕头上。这时候妈妈正在厨房里忙碌着。

我当然感到胆怯，偷偷地到城里去了。我在街上徘徊，一直在猜测，妈妈是不是已经看过了那几篇小说。最后我忍不住，于是回家来了。

给我开门的是妈妈。她用双手捧着我的头，用力吻了吻我的前额，她的眼睛里带着泪痕。

“要是你知道的话，”她说。“我刚刚看了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啊！谢谢你，科斯季克，以我们大家的名义——以你父亲、哥哥们，还有我们不幸的加莉娅的名义。”

妈妈说不下去了，她坐到前室里的一个小凳子上。

“给我点儿水。”她请求说。

我从厨房里拿来一杯水，给她喝了。

“而这是我的儿子，”她几乎是喃喃地说，并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双手。“我的科斯基克！”

“看你说的，妈妈！”我说，试图安慰她。“我要留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

“用不着！”妈妈坚决地回答。“走你自己的路吧。只是要记住——可别忘了我们。”

她突然蜷缩成一团，痛哭起来。我抱住她，让她紧紧偎依着我。

“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她吞声饮泣，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会感到多么幸福啊。他是一个极好的人，科斯基克。世界上最好的好人。我什么都原谅了他。你也原谅他吧。你的青年时期是很艰难的。现在对于我来说死已经并不可怕了。不过你要答应我，如果我死了，你要把加莉娅接到你那里去。”

我答应了她，但一切都完全不像妈妈所期望的那样。她连我的第一本书也没能看到。生活为她 and 加莉娅所作的安排是严酷的，也是不公正的。

有一年夏天我去波提，到科尔希达去，打算写一本关于亚热带的书。在波提我害了一种“蓝色”斑疹伤寒，长期住在医院里，和死神搏斗了很久，而在这时候，妈妈在基辅死于肺炎。一星期后加莉娅也死了。没有妈妈，她连几天也无法生活下去。她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而且始终也没能弄清楚。

阿玛莉娅把妈妈和加莉娅并排埋葬在巴伊科夫墓地干燥、荒废的坟墓中间，那里的坟墓拥挤得令人感到可怕。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们的坟墓，上面已经长满黄色的荨麻，——两座坟墓连成了一座坟丘，上面有一块已经弯曲、翘起来的洋铁皮牌子，上面的题词是：“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和加琳娜·格奥尔吉耶芙娜·帕乌斯托夫斯卡娅母女。愿她们安息！”

我没有立刻辨认出这已几乎被雨水冲刷掉的题词。从牌子上的一条裂缝里伸出一根苍白的、几乎是透明的草茎。想到这就是一切，是会感到奇怪而痛苦的。想到这草茎就是她们艰苦的一生的惟一装饰品，这草茎就像加莉娅病态的微笑，就像从她失明的眼睛里流出、停滞在睫毛间的一滴小小的泪珠——它是那么小，以致无论谁永远也看不到它，想到这一切，是会感到奇怪而痛苦的。

我只剩下孤独一人了。大家都死了。给予我生命的母亲——这生命不是无益的，也不是偶然的——长眠在这里基辅的黏土下，墓地的一个角落里，旁边就是铁路的路基。我坐在坟墓旁，感觉到沉重的列车驶过时，大地在颤抖。大概，在那里，在坟墓里，妈妈仍然像在生前一样为我担心。她常常看着我的眼睛，问：

“你什么也没瞒着我吗，科斯季克？当心，可别瞒着啊。你是知道的，我随时都准备到天涯海角，去帮助你。”

田野上的寂静

那时候，一九二三年八月，我从基辅回到了莫斯科。

我剩下的钱还够过一个月半饥半饱的生活。得在莫斯科的报馆里找个工作。但不久前外高加索的暑热把我折磨得疲乏极

了，我不但没有去找工作，反而却梦想着俄罗斯中部地区潮湿的小树林和清凉的河流，梦想着一定要到某个偏僻的农村里去，哪怕只住一个不长的时期也好。除此而外，我希望在生活的一个新时期开始的时候，与旧农村告别——现在已经是永远告别了。我亲眼看见过旧农村，而不仅仅是从契诃夫和布宁的小说中了解它。

有一个机会帮助我与旧农村告别。在莫斯科我暂时住在石榴小巷从前那个女房东家的、一个出差去的房客房间里。

一九一七年和我一起住在这位女邻居——脸上有雀斑的、训练班的女学生莉波奇卡——仍然住在这里。她怎么也不能在医学院里毕业。

和五年前一样，常有同乡从梁赞的农村里到莉波奇卡这儿来，带来一些蜂蜜和苹果，把在莫斯科能够弄到的一切都带回去——就连麻屑和一叠叠卷纸烟用的旧报纸也要带回去。

莉波奇卡的父亲是梁赞附近的一个乡村神父。莉波奇卡细心隐瞒着这一情况，但是还在一九一七年我偶然知道了这一真情。当着我的面，莉波奇卡嘲笑地把她父亲称做“我的神父”。

根据莉波奇卡的建议，我到 he 那里去住了两三个星期。

奥卡河把梁赞省分作两个独特的地区：北半部——森林多，沼泽多，南半部却只有田野和沟壑。莉波奇卡的父亲居住的叶基莫夫卡村在南半部，在一望无垠的田野里。

我为所去的地方没有森林而感到不快。但过了梁赞市以后，在一个叫斯坚金诺的小车站上，我刚一走出取暖车厢，立刻就忘记了自己的不快。

扑面吹来一股黑麦的暖气。田野上的寂静迎上前来，紧紧靠近我的身边，除了正在离去的火车遥远的汽笛声，没有任何声

音触动这样的寂静。

我在月台上几棵老榆树下稍微站了一会儿，闻到了早已忘却的、大车车轮上的焦油味。一棵榆树上拴着一辆大车。一匹灰骗马正在打盹儿，不时动一动发干的皮肤。

大车是莉波奇卡的父亲派来接我的。赶车的是一个叫弗拉斯的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脸上有麻子，神情阴郁，一路上努力用鞭子抽打那匹骗马凹陷下去的两肋。对于我提的各种问题，弗拉斯都只用一句话来回答：“我咋知道呢？”

我们坐在车上好久默默不语，后来弗拉斯终于鼓起勇气说：

“我们的神父，彼得神父，是个鳏夫。年纪老，耳朵也有点聋。这匹骗马是主席借给他的。贫农会的主席。”

不久，沙沙作响的黑麦海洋上方出现了一座白色的钟楼和教堂的绿色圆顶。圆顶上的十字架歪向一边，眼看就要倒下来了。一些麻雀落在十字架上，互相推推撞撞，正在闹纠纷。

彼得神父的房子在村外，就在教堂附近。房子周围密密麻麻长满了接骨木和已经变成野生的丁香，所以只看得到台阶。

彼得神父穿着一件祭服下的旧茧绸内长衣走了出来。他个子不高，后脑勺上耷拉着几绺细长的白发，用颜色很淡的眼睛看着我的脸，齿音发音不清地说：

“谢谢，承蒙不弃，前来看望我这个老头子。我们过的是穷日子。不过常言说得好：‘即使吃糠，也不抛弃叶基莫夫卡——我的故乡。’您休息休息吧。空气，我们这儿有的是。”

于是我住在了这座房子里，这个耳朵有点儿聋的老头儿整天不知在屋里慢腾腾地忙些什么。

“我真不知道，”他用好像搞什么阴谋似的口气说。“为什么不碰我这个上帝的奴隶？莫非是体谅我年老吗？还是因为这个